

因为人类是聪明的,不致完全灭绝,极少数残存的人类,在外层空间飘荡着,不知多少光年,企图寻找第二个地球。一代又一代,在宇宙飞船里传授知识,放映影片给孩子看。

曾经,有一个地球

张曼娟

谷雨才刚过去,立夏还未来临的时候,岛上的气候着实阴霾了一阵子。

谷已成雨,夏犹未立。因为气流的变化,我所居住的地区,空气里有腐败恶臭,是一股特属垃圾的气味。

由前几年的不能容忍,不可置信,到现在的不以为意,我看见自己性情本质中的姑息。

朋友送我回家,开车门时大惊失色:“天啊!怎么这么臭!”“不知啊,我仿佛有些愧疚,分辨说:

“还好啦!天气不好嘛。”

垃圾掩埋场尚未动工,隐隐然便觉得事情不会像有关单位允诺的那样完美。问题果然发生,渐渐连指贵的力气都没有了。

前几个月,本区居民强烈要求垃圾场迁移,并有小规模抗议陈情。

反复思量,终究没有去参加。因为,垃圾处理已形同灾难,如果,无法寻得解决脏与臭的方法,那么,迁移到任何地方都是灾难。我们已是受害者,怎么忍心再把灾害推给别人?

是的,我知道这是愚不可及的愚仁愚义(但,聪明人并没有提出什么好办法)。

我在自己的想法中取

得平衡。每夜,自腐臭的气味中归来,进入门窗紧闭的小屋,安静地读书、写作,甚至带着浪漫的情绪,给远方的友人复信。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

我并没有刻意穿上绿衫子,因为再怎样也不能变成一株树;只是拒绝外出的邀约,避免污染或被污染。

也就在那天的晚间新闻,我看见国外传播媒体拍摄的影片,台湾人在澎湖屠杀海豚的现状。

我一直知道,人们为取象牙而屠杀大象,为保护农作物而屠杀袋鼠,为减少的渔获而屠杀海豚,为口腹之欲而屠杀各式各样的飞禽走兽。

曾经,我带着三个活泼可爱的小孩,去市场买活鱼。孩子们快乐地挑选了一尾鱼,鱼被敲昏以后,在砧板上迅速地开膛破肚。拎着鱼回家时,塑料袋仍不时抖动,孩子问我:

“把鱼放回水里,它能不能活?”(后来我才想起那孩子的不忍和企求。)

晚餐时,他们全体拒食那尾新鲜美味的红烧鱼。那大概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面对的杀戮和血腥,他们觉得恐惧,或者还有厌弃吧。

可是,经历了多,是不是也会变得无动于衷?我在海洋世界看见那

些体形优美的海豚,聪敏灵巧,撒娇地向观众讨掌声。智能仅次于人类的动物,在所有的童话故事里,都是善良、有感情的好朋友。

然而,在澎湖海滨的渔船上,一条活生生的海豚,未经麻醉或特殊处理,被人用锯刀削下头来,血泊之中,海豚因剧痛痛楚而弹跳,它的头便一寸一寸地支离身軀……当我看见这个画面的时候,几乎忍不住从肺腑之中痛嚎出声,肝胆俱摧地。

但,我们的孩子呵。那些在船边围观的孩子,尖锐亢奋地叫着、笑着,这个残暴的仪式,仿佛是他们的嘉年华会。

童年记忆,永不磨灭。孩子们长大后,会不会变成嗜血的一群?

人们害怕离散,苦痛,却时时将这样的噩运横加于其他生物的身上。

根据植物学家研究,即便是树木,也能传递彼此的讯息,也有相通的心灵。在阿里山上,有一座让树魂寄托的碑,因树林无故遭到砍伐,这样的补偿,确有庄严意义。

如果植物都有感觉,动物便该有七情六欲了。

国外动物保护人员在澎湖海边,发现撞港自杀的海豚,很觉惊异。推想它大概情绪低沉或受了刺激,

才有厌世的做法。我却想,假若,它亲睹自己的骨肉、同伴或情人遭受屠杀,那么,它如何表达悲恸与怨恨?

它也是有知觉、有情感、有记忆的啊!

每一年,地球上平均有两种动物被灭种绝迹,再进步的科学,也不能再造已经灭绝的生命。

还要过多少年,河川全遭污染毒害;山林全被破坏殆尽;动植物都无法生存,地球上没有四季。

因为人类是聪明的,不致完全灭绝,极少数残存的人类,在外层空间飘荡着,不知多少光年,企图寻找第二个地球。一代又一代,在宇宙飞船里传授知识,放映影片给孩子看。

这是海!海里有许多鱼,最聪明的是海豚……当然,已经绝种了。

这是树林!这是松鼠,这是鹿……这是蝴蝶!是的,真是太美了,可惜,也绝种了。

这是田地,金黄色的谷粒是人类的食物,这是蔬菜,这是水果,都是人类的食物。

可是,人类把所有的一切都破坏了。把整个地球都毁灭了!

人类是什么?我也问过我的老师,可是,没有答案。

孩子们,我想,人类一定是邪恶贪婪的可怕力量。他们毁了一切,必然也毁了自己。

如今,我们不停地流浪漂泊,就是在找寻另一个地球。

摘自《百年相思》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我必须成为总统

“他们一齐来欺负我,我从来都是一个人,他们说我是外来的小崽子。”他委屈地说。“外来的小崽子又怎样,没权利骑山地车吗?不,别说骑山地车,就是总统也一样可以当。”父亲大声地喊着,把被毁坏的自行车扛在肩上,显得那么有力和威武。

年仅10岁的他不太理解父亲的话,但是他知道总统是一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他想,没人敢把总统的山地车摔倒在地,更不敢用脚去踢。那天晚上,他在日记本里写下这样一句话:

“我不是想成为总统,而是我必须成为总统!”他幼小的心里种下了一枚梦想的种子——成为总统。他没有把梦想告诉任何人,害怕受到嘲笑。因为连他自己都觉得这个梦想有点奢侈,对他来说太高太远。

12岁那年,父亲失业。家里的景况越来越差,他常常去一些酒馆帮忙,讨到好吃的饭菜。家里没有电,他

就在木墩上垫上一块羊皮,坐在煤油灯下苦读。只要有书读,不论多苦,他都不在乎。在他看来,读书是改变现实的唯一办法,有知识的人才可以当总统。

然而,现实再次给这个少年沉重的打击。15岁那年,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供他读书。告别学校那天,他对父亲说:“爸爸,我没什么希望了,再也没什么希望了。”父亲没说一句安慰的话,反而怒斥他:“不许你说这样的话,你的未来还很长,你现在就绝望、认输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孩子。”他说:“我不认输,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孩子,要改变现实,就必须先勇敢面对现实。否则,你一辈子只能这样,贫困而可怜。”

他擦干眼泪,重新开始。放学,当乐队号手、做泥瓦匠、当糖厂工人。他饱尝生活的艰辛,还有社会对移民者的歧视和虐待。他哭过、泄气过,但没有退缩过。

当名人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

朱德庸

迫成为一个被观察者,这点让我难以忍受。但只要是人,都有虚荣心,即使是我,但每当享受完那一点点虚荣之后,伴随而来的就是坐立不安。因为你既然享受过做一只猴子,就得一直当一只猴子被人观赏了。

我讨厌当名人,如果数得出世间无聊事的清单,当名人就是其中一项,我以前常开玩笑说:名人只有三秒钟寿命,因为大部分人都会在名人之后,大约三秒就都忘了。我也不喜欢名人,因为大部分名人总是想尽办法延续那三秒的寿命,所以会不停地制造新闻。就因为如此,我想我可能是极少数结交

名人朋友的名人吧。

对我而言,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一个人真正应该注意的。许多网友羡慕我做一个城市的隐居者,我想这证明了许多人并不汲汲名利,而在乎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隐居生活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其实只要用对方式,人人都是可以隐居者。但隐居人并非山野中人,在喧闹的城市过隐居生活更有其挑战性。每天上班并不妨碍你的生活,要拥有基本的生存条件才有可能做一个隐居者。

就我多年的经验,我认为一个城市隐居者应具备

下列条件:

一、不需要有固定的工作,但需要有一定的收入。

二、居家环境不需要太热闹,但必须具备基本生活功能。

三、另一半要么也不喜欢当隐居者,要不就放任你做个隐居者。

四、认清自己的生活方式。

五、要有个人喜好或兴趣。

每个“城市隐居者”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方法是可以相互学习的,欢迎大家也提供自己的城市隐居经验供我参考,多谢啦。

摘自《北京娱乐信报》

在一片落叶前流连忘返

韩少功

旅游的一般过程,是交出笔钱以后,被交通工具规定了观察线路,被旅游设施规定了观察方位,被讲解员规定了观察时的联想,还有“到此一游”的摆拍地点以及固定的笑容。旅游者于是心满意足:天下第一峰呵,举世无双呵,不虚此行呵,诸如此类。这几乎是一套法定的公共成套动作。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旅游者,连黄山、庐山等

厄瓜多尔国家警察总司令和特警司令多次接见了周士峰。在特警汇报表演仪式上,厄瓜多尔国家警察总司令授予周士峰厄瓜多尔国家警察“哈林少校”特警队荣誉队员称号。当地电视台对特警的演练现场直播。

厄瓜多尔的中国教头

总统一请

“太棒了,太棒了!中国教官的功夫简直太神奇了!”台下观摩中国教官表演的厄瓜多尔警察一边看一边喊,拍红了巴掌,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伸出了大拇指。

正在台上表演的这位让外国同行赞不绝口的中国人,是专门从中国请来的厄瓜多尔总统卫队当教头的中国警察周士峰。

厄瓜多尔这次专程从中国请来了“武艺高强”的“大师”,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厄瓜多尔国家特警队组建了该国74年来第一个人战术防卫训练班。而且训练班里的80名高级学员,个个来头不小,都是厄瓜多尔总统的特警卫队成员和从该国各地选拔上来的警察精英。而厄瓜多尔对“中国功夫”一向推崇,因此,专程从中国请来“洋教头”。

中国方面对此也十分重视,选中了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武术系、六次获得中国全国拳击比赛冠军、国际跆拳道五段、中国公安大学警务格斗的首席主讲教师周士峰副教授。

赤道执教带来挑战

到地处赤道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执教,这对中国警官来说是一种挑战。

“来厄瓜多尔之前,我对这个国家的情况了解并不多,为了高质量完成援教

等都没去过,一听哪里火就对哪里怕,尤其不喜欢那些假帝王、假牛仔、假大师、假新娘的身份客串。F·佩索阿(编者注:葡萄牙著名作家)说,他更愿意“游历第八大洲”,即蜗居斗室里的个人想象。我没有他那样的自闭,只是相信空间还有另一种展开方式,相信人们完全

可以投入另一种运行,比方以前的荒坡一角为目的,订一张免费船票或免费机票,于是在石片里俯瞰黄山,在杂草里发现大兴安岭,在身旁的石洞清潭中触摸太平洋。

只要人们愿意,他们还可以自立宪法,发动革命,在细胞、分子、原子的世界里任意创建共和国。

只要人们愿意,他们还可以捏一捏火星,搓一搓金星,摘一颗冥王星放入口袋,在细胞、分子、原子的世界里举步跨进另一条银河——这一切只需要我随便找个什么地方蹲下来,坐下来,趴下来,保持足够的时间,借助凝视再加一点想象,就可以投入另一片灿烂太空。

我最终在一片落叶前流连忘返。

摘自《山南水北》

任务与实战对抗结合起来,丰富教学内容。

训练过程中,厄瓜多尔警察司令还提出,希望周士峰额外传授一些警察实战技术。于是,周士峰除了白天正常授课外,晚上还要加班写教案,临时增加了徒手擒拿、警械使用和综合缉捕等技能训练课程。

以中国功夫为兴趣点教学

与厄瓜多尔特警接触的周士峰发现,这些厄瓜多尔特警对成龙在电影里的功夫很感兴趣,于是他便利用这些“洋徒弟”对电影里的中国功夫的浓厚兴趣,结合自己的专长,把中国武术的一些基本动作糅合到警械使用、综合缉捕等实战技能中。

这样一来,厄瓜多尔的特警学员发现,自己可以变得和电影里的中国功夫明星一样棒,积极性更高了。很多人不用催促,还利用休息时间自己“加班”。

由于所教授的都是实战性很强的擒拿格斗招数,又结合了电影里的中国功夫,“洋徒弟们”对周士峰的教学非常认同和赞赏。一名“洋徒弟”说:“中国教官让我们对每节课都充满了期待。”

“洋徒弟”为中国师傅自豪

在厄瓜多尔特警队第一届警务战术和防卫课程的结业和颁奖仪式上,厄

特警队员表演了中国教官教授的“擒拿格斗术”。表演赢得了来宾们的阵阵掌声,中国教官亮出的中国功夫,更是让在场观摩的人们交口称赞。他们纷纷夸赞这些队员出拳如风,动作干净利索,教官的中国功夫更是神奇,有机会一定要到中国去参观。

在当地警察看来,周士峰的讲授让他们耳目一新,周警官的工作是出色的,各个阶段的教学得到了该国警察部门的赞赏。

厄瓜多尔国家警察总司令和特警司令多次接见了周士峰。在特警汇报表演仪式上,厄瓜多尔国家警察总司令授予周士峰厄瓜多尔国家警察“哈林少校”特警队荣誉队员称号。当地电视台对特警的演练现场直播。厄特警司令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Simon Zhou”(一种尊称),当地人,在厄瓜多尔,只有人们公认的英雄才能配此称呼。

在厄执教期间,周士峰多次接受厄瓜多尔电视台的采访,并两次成为当地中文杂志的封面人物,在厄瓜多尔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因为他的教学,中国功夫一时间引起当地人们的极大关注,“中国”一词在当地频繁出现。洋徒弟们为有中国师傅而自豪,为了中国功夫而骄傲。

摘自《环球时报》

名流故事

教授在我的“导言”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季羨林

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罕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没有新见解,不必写文章。见解不论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徂订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的精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学位题目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时好像蜜蜂采蜜,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法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佳主意。我照此办理。费了很长的时间,写出一篇相当长的“导言”。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

到了教授。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教授在我的“导言”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是,经过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觉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我毕生受用不尽。

第二件事就是,论文完成后,口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要知道,在三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烦琐。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乏味就多乏味。然而老教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写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方法来一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往往都参加着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分工。他们是以为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不出错误。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

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別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不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不同。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不时出点问题的。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出错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对,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这是责任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怕它什么读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跟不上。即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

我上了9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也许有人会认为此辈之无甚高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年届耄耋,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点。

摘自《我的人生感悟》